

从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入藏看藏外佛经的入藏基准

◎ 张美侨

内容提要:《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被认为是历代汉文大藏经的入藏基准。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不见其中,属藏外佛经,却在日本平安后期(12C.)古写经中得以发现。日本平安后期古写经,可以追溯至奈良时代(8C.)从中国长安带回的写经。日本国家书写一切经事业,就是以《开元·入藏录》为基准,分别抄写了入藏和不入藏佛经。《须摩提经》在北宋开宝藏中的入藏,表明在汉文大藏经形成的初期阶段,《开元·入藏录》的权威性基准地位并未形成,各地域诸寺院仍有各自的入藏取舍标准。开宝藏以降的高丽再雕藏、北方系统契丹藏和江南系统诸藏依据自身编纂方针,对《须摩提经》的入藏作有不同的取舍。流志译《须摩提经》是否入藏的过程,是《开元·入藏录》作为汉文大藏经基准地位确立的验证和典型个案。

关键词:《须摩提经》 藏外佛经 日本古写经 刊本大藏经

作者简介:张美侨,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一般而言,见于汉文大藏经(亦称“一切经”)中的佛经,即是“藏内”佛经。因各时代诸藏所依经录和编纂方针的不同,入藏的取舍标准也略有差异。取舍标准,起初是受道安疑经录影响^①。隋代法经《众经目录》将“疑惑”“伪妄”以及从大经中抄出别行的“别生”分别作录,予以排斥。费长房首创“入藏录”,开启入藏佛经编目传统。但专门指出哪些佛经不应入藏,则晚至开元十八年(730)智升的《开元释教录》(简称《开元录》)。

《开元录》分“总录”和“别录”两部分。“总录”是按照朝代顺序记录各朝译经;“别录”以经为序,分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拾遗补阙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等七类。此外,智升在“有译有本录”所收经典之外,又将所收佛经著录经名、卷数、合秩、异名、异卷、异秩以及所需纸数,形成一部简明实用的入藏录,其中的五千零四十八卷佛经,则成为历代汉文大藏经的收经基准^②。在入藏录最后,还列有被《贞元新定释教录》冠以“不入藏录”的118部佛经^③。

这118部佛经,或是从大经中抄出别行的“别生”,或是经文缺失,或与他经经文重合,或是寻本未获,以及内容或疑或伪的经卷^④。智升在《开元·入藏录》末尾单独列出,必然有其特殊的考量。目前,关于“不入藏录”的问题似乎还未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

① 道安曾有“泾渭杂流、龙蛇并进”的叹息《出三藏记集》,《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55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藏出版1924—1935年,第38页。

② 方广铨:《佛教大藏经史(8—1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6、246页。

③ 在《开元录》基础上添加不空所译佛经的《贞元录》,后来成为日本平安时代书写一切经的基准。

④ 《开元释教录》,《大正藏》第55册,第698—699页。“不入藏”有八条原则,参[日]宫崎健司:《天平勝寶七歳における「大宝積經」の勘經》,《正倉院文書研究》第2卷,1994年,第71—95页;[日]山下有美:《五月一日经における別生・疑偽・録外經の書写について》,《市大日本史》第3卷,2000年,第44—73页;[日]落合俊典:《七寺一切經と古逸經典》,《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第一卷《中國撰述經典》,東京大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439—441页;落合俊典:《愛知縣史》別編《七寺一切經の藍本》,名古屋愛知縣史編纂委員會編,2015年版,第45—69页。

“不入藏”佛经难以保存于世，幸赖敦煌写经中“藏外佛教文献”，日本古写经、特别是名古屋七寺古逸佛经的发现，为认识和研究“藏外”和“不入藏”佛经提供了实物材料。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未被收入《开元·入藏录》，甚至应被归入“不入藏”之一，却又不见于118部佛经之中。但仍在七寺中得以发现，同时亦被刊本大藏经所收成为“藏内”。为谨慎起见，本文未将《须摩提经》径直称为“不入藏经典”，而将这类属于《开元·入藏录》之外的佛经，同时又并非是所有写本、刊本中的“藏内”佛经，统称作“藏外佛经”来研究其特殊的入藏过程，并借此考察大藏经的入藏基准问题^①。

一、一经多译：“藏外佛经”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

《须摩提经》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出三藏记集》将《须摩提经》和《须摩提菩萨经》两者，记作竺法护译《须摩经》的异名^②。《众经目录》则将《须摩提菩萨经》录为竺法护译经的正名，将《须摩提经》记作异名^③。但从《历代三宝记》以来的经录，又有鸠摩罗什翻译《须摩提菩萨经》的记载^④。比较法护、罗什译本，两者除了佛经中的人名、地名和其中一部分内容有差异外，大部分的长行和偈颂基本一致^⑤。

随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将法护、罗什译本列为“同本别译”^⑥。智升在前人基础上，又补充了另两个译本，即菩提流志先译的《妙慧童女经》一卷，和新译、被收入《大宝积经》第三十会的妙慧童女会。各译本在历代经录的收入情况，可见表1。

智升《开元录》卷9对“流志先译”“流志新译”作了如是论述：“《妙慧童女所问经》一卷（第三出，与须摩提经等同本，长寿二年于大周东寺译）。”又在同书卷11指出：“第三十妙慧童女会兼后一卷，大唐三藏菩提流志新译（第四译），右新译重本。与旧两译须摩提经、及流志先译妙慧童女经、同本异译。当第九十八卷。从初至半（其先译妙慧经本、在东都寻之未获）。”^⑦ 长寿二年（693）在大周东寺翻译的《妙慧童女所问经》是“第三出”，可视为“流志先译”。《大宝积经》第三十妙慧童女会是“第四译”，属于“流志新译”。而《开元录》卷11中的“流志先译”，是和卷9《妙慧童女所问经》的经名稍有不同的《妙慧童女经》，且当时在洛阳已寻找不见。

再者，《开元录》卷17“别录中删略繁重录”的“新括出合入大部经”中，在《三律仪经》后有如下记载：

右三律仪经下。合二十六部共四十四卷。大唐先天二年南印度三藏沙门菩提流志（唐云觉爱）于西崇福寺译，并是宝积诸会编在大部之中，亦有抄写别部流行。恐不知根源，故具条示^⑧。

“妙慧童女经一卷（与旧须摩提经同本）在第三十会”正位于这里的“二十六部”之中^⑨。

① 参蓝吉富：《刊本大藏经之入藏问题初探》，《中华佛学学报》2000年第13期，第167—178页。

② 《出三藏记集》，《大正藏》第55册，第8页。

③ 《众经目录》，《大正藏》第55册，第115页。

④ 《历代三宝记》，《大正藏》第49册，第78页。

⑤ 竺法护译本和鸠摩罗什译本的比照，参见[日]金冈圆照：《须摩提经について》，《大崎学报》125、126号，1970年，第223—248页。

⑥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大正藏》第55册，第387页。

⑦ 《大正藏》第55册，第569页。

⑧ 《大正藏》第55册，第666页。

⑨ 同前注。

由此可知,《大宝积经》第三十妙慧童女会是菩提流志于先天二年(713)在西崇福寺翻译的《妙慧童女经》。结合卷11的记载,智升将流志的先译、新译均称作《妙慧童女经》,且指出新译因被编入《大宝积经》,若再于别部单独流行,容易导致混乱不知根源,故而将连同新译本《妙慧童女经》在内,已被收入《大宝积经》的26部经名列入卷17此处。

表1 历代经录所见《须摩提经》

经录	朝代·作者	法护译	罗什译	流志译
出三藏记集	梁僧祐	○	×	×
众经目录	隋法经	○	×	×
众经目录	隋彦琮	○	×	×
历代三宝记	隋费长房	○	○	×
大唐内典录	唐道宣	○	○	×
众经目录	唐静泰	○	○	×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武周明佺	○	○	×
开元释教录	唐智升	○	○	×

比较《大宝积经》妙慧童女会和流志译《须摩提经》的内容,二者几乎一致。差异之处仅在于“天雨妙花,天鼓自鸣。说是语时,于虚空中,花散如雨,天鼓自鸣,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一句,不见于后者。因此,虽然从内容上还无法判断流志译《须摩提经》就是早已不知影踪的先译本《妙慧童女(所问)经》,又或是被收入《大宝积经》的新译本,但若将流志译《须摩提经》入藏,则必然造成和《大宝积经》妙慧童女会重合,进而违背“不入藏”的第一条原则^①。那么,这部不见入藏录又不见于“不入藏录”的“藏外佛经”,是否从未入藏,一直都是“藏外佛经”呢?

二、最早的写本:日本古写经中的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及其渊源

汉文古写经分为敦煌写经和日本古写经两种。敦煌写经中,现存有罗什译《须摩提菩萨经》断片^②,未发现流志译《须摩提经》。日本古写经的调查研究发轫于养鹗彻定,继其《古经搜索录》《古经题跋》^③之后,石田茂作、田中堯堂、塚本善隆、牧田谛亮等学者的研究使日本古写经备受学界重视。近年,伴随日本古写经数据库的构筑,相关研究日益深入。

关于日本古写经的收录情况,首先可以利用的是《日本现存八种一切经对照目录》。这一目录中,法护译《须摩提经》为圣语藏、七寺、石山寺、兴圣寺、松尾社一切经所收;罗什译《须摩提菩萨经》为金刚寺、七寺、兴圣寺、西方寺、新宫寺、松尾社一切经所收;并未列出流志译《须摩提经》^④。这一目录是依各寺社的调查报告书而来,下面将原调查报告书的记载与可见的古写经图片资料进行再确认^⑤。

① 《开元释教录》,《大正藏》第55册,第698页。

② 段文杰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9、258页。

③ [日]养鹗彻定:《古经搜索录》,嘉永5年(1852)编集,之后被神田喜一郎所藏。1972年,由东山学园影印出版神田氏所藏本。同氏:《古经题跋》,文久3年(1863)编集,明治2年(1869)和《译场列位》一起刊行。之后又同被收入《解经丛书》(东京国书刊行会1916年)。

④ 2007年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在文部科学省私立大学学术高度化推进事业“奈良平安古写经研究据点的形成”项目学术委员会编:《日本现存八种一切经对照目录》,第30—31页。

⑤ 由于目前暂无法阅览兴圣寺、西方寺、新宫寺、松尾社这四个寺社的古写经,本文暂不将之纳入讨论。

《正仓院圣语藏经卷目录》所记《须摩提经》，确为圣语藏图片资料内的法护译《须摩提菩萨经》^①。经日本古写经数据库确认，金刚寺所藏本亦确是罗什译本^②。不同的是，七寺目录中记载着被误以为是法护和罗什译本的《须摩提经》和《须摩提菩萨经》两部^③，首题写作“须摩提菩萨经”，尾题作“须摩提经”，尾题后又有双行小字“如何同经有二卷 / 亦恐配秩不分明”的，为法护译本。但另一部“须摩提经”的首题下方，却赫然写有“大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 诏译”一句，可见七寺所藏并非罗什译本，而是流志译《须摩提经》^④。

关于12世纪七寺写经的母本，落合俊典在考察《求法高僧传》时，指出七寺本《求法高僧传》或许是以奈良朝写经为底本书写而来^⑤。此外，他还认为七寺一切经中一半以上是奈良朝写本的转写本^⑥。那么《须摩提经》和《须摩提菩萨经》是否在奈良朝已被传入日本呢？《大日本古文书》天平胜宝三年（751）的“写书布施堪定账”中，记录着和《开元·入藏录》内容一致的“须摩提经一卷、须摩提菩萨经一卷”两部佛经^⑦。另外，在天平胜宝七年（755）左右，日本开展了《大宝积经》勘经事业，留有十多条和这两部佛经相关的记录^⑧。在勘经机关宝积经所向药师寺勘经所提出“为正宝积经勘经所误”的记录中，有《须摩提经》一卷的请求^⑨，这或许是宝积经勘经所注意到流志译《须摩提经》和《大宝积经》妙慧童女会的关系之故。此外，勘经事业开始一个月后，又有对《开元录》卷11“有译有本录”的请求^⑩。这恐怕是因卷11对一经多译信息的记载更为丰富，进而方便勘定《大宝积经》。勘经所是否对入藏佛经做有改动，不得而知，从七寺藏法护译本尾题后的小字来看，日本古写经照抄底本，并不自主修改。因此，后世的平安写经，可谓窥见奈良朝写经原貌的重要材料。

日本的国家一切经书写事业以带有天平十二年（740）五月一日愿文的“五月一日经”为开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天平八年（736）九月玄昉归日带去的《开元·入藏录》为基准抄写一切经。由于当时的日本无法搜齐入藏录中的所有佛经，因此第一方针仅持续到了天平十二年。从天平十五年（743）五月开始，根据新的书写方针，《开元·入藏录》中没有的别生、疑伪、录外经，以及章疏类也都被纳入书写范围^⑪。据山下有美“天平13年目录中所见的别生、疑伪、录外经的本经”表可知，“大乘出经”和“目录外经”记录的几乎都是以玄昉带回的佛经作为本经，于天平八—九年（736—737）书写而来^⑫。在“自天平八年九月廿九日始经本请和上所”的“写经请本账”中，亦刚好有“须摩提经一卷”的记录^⑬。结

① 奈良帝室博物馆正仓院挂：《正仓院圣语藏经卷目录》，1929年版，第49页。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编：《圣语藏经卷：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所藏》第3期神护景云2年御愿经（东京：丸善，第2007—2015年）。

② 国际弘教学大学院大学古写经データベース：<http://koshakyo-database.icabs.ac.jp/about/site>。

③ 《尾张史料七寺一切经目录》，名古屋：七寺一切经保存会，1968年版，第27页。

④ 写本信息如下：完本。纸本墨书。卷子本一卷。有轴。楮纸打纸（黄槩染）。天地朱界纵墨界。全八纸。一纸二十六行。一行一十七字前后。表纸有破损。第二纸纸高26.7cm、纸幅47.2cm、界高20.8cm、界幅1.8cm、天界2.8cm、地界3.1cm。外题：须摩提经。首题：须摩提经。尾题：须摩提经。题记：一校了。

⑤ [日]落合俊典：《〈求法高僧传〉の諸本について》，《佛教论叢》34号，1990年，第51—53页。

⑥ [日]落合俊典：《七寺一切经と古逸经典》，第435—436页。

⑦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大日本古文书》第12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第97页。

⑧ 参见木本好信：《奈良朝典籍所载佛书解说索引》，东京国书刊行会1989年，第194页。

⑨ 《大日本古文书》第13卷第132—133页。

⑩ [日]宫崎健司：《奈良时代的一切经について一勘经の意義をめぐって一》，第27页。

⑪ [日]山下有美：《五月一日经“创出”の史的意義》，《正仓院文书研究》六，东京吉川弘文馆1999年，第44—48页。

⑫ [日]山下有美：《五月一日经“创出”の史的意義》，第55—56页。

⑬ 《大日本古文书》第7卷，第68页。

合上文对玄昉经中存有录外佛经一事来思考，在七寺发现的流志译《须摩提经》，或许是乖离了奈良朝写经第一方针的结果，若然，即和其他古逸佛经的渊源一致，均是得益于奈良朝对“藏外佛经”的抄写。

在奈良时代以《开元·入藏录》为准书写的写本一切经中，出现了偏离入藏录的部分，即使抄写的别生、疑伪和录外佛经可能并不属于“藏经”系统，但不得不承认，这是造成某些“藏外佛经”流传后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不一样的开宝藏：刊本大藏经中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的入藏情况

关于刊本入藏状况，首先以《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为线索对流志译《须摩提经》的入藏情况做一概观。该经被金藏、高丽再雕藏、大日本校订缩刷大藏经、频伽精舍校勘大藏经、大日本续藏经以及缘山三大藏经所收录^①。其中，大日本校订缩刷大藏经、频伽精舍校勘大藏经、大日本续藏经均是以高丽再雕藏为底本刊刻而来。三缘山（日本东京增上寺）则收有高丽再雕藏一藏。可以看出，将此经入藏的仅有金藏和高丽再雕藏。方广镛曾将中国宋、元时代的汉文大藏经，按照地域分为三类。第一类，中原系统：开宝藏及其覆刻本的金藏、高丽初雕版、高丽再雕版；第二类，北方系统：契丹藏；第三类：南方系统诸藏^②。流志译《须摩提经》在这三类藏经中的入藏情况详见表2。

表2 刊本大藏经中《须摩提经》的入藏情况

	法护译	罗什译	流志译
中原系统开宝藏系	○	×	○
北方系统契丹藏系（辽代的房山石经）	○	○	×
江南系统系（东禅寺版、思溪版的复刻本）	○	○	×

由表知，流志译《须摩提经》被第一类中原系统的开宝藏诸藏所收入，并不见于第二类、第三类诸藏。因此，下文主要对开宝藏及其覆刻本的入藏情况作一阐述。

目前仅有12卷存世的开宝藏，是以983年在益州流传的写本一切经为底本刊刻而成。流志译《须摩提经》是否被开宝藏所收，首先从目录入手进行考察。北宋惟白于崇宁三年（1104）所著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简称《指要录》），将两部《须摩提经》合并记载为“须摩提经二经 大宝积经妙慧童女会同”^③。被认为是崇宁四年（1105）一部大藏经解题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简称《标目》）则记载如下：

须摩提经一卷、亦直云须摩经。须摩提菩萨经一卷。右二经。与宝积第三十妙慧童女会、同本异译。解在宝积。^④

何梅据此认为：“（《标目》）以《开元录》著录的经目替换《指要录》的经目，它们是：服帙，

① 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新文丰出版1983年，第39页。

② 方广镛：《佛教大藏经史（8—10世纪）》，第246页。这与竺沙雅章的分类相合，参竺沙雅章：《汉訳大藏經の歴史—写經から刊經へ—》（大谷大学、1993年版）；氏著《宋元仏教文化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年，第271—291、336—342页。

③ 《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大藏出版会1991年，第617页。

④ 《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第783页。

以姚秦鸠摩罗什译《须摩提菩萨经》，替换有问题的唐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①。”由此可知，《标目》和《开元录》一致，均收入罗什译本，而《指要录》中的“须摩提经二经”是法护译本和流志译本。

金藏是在金熙宗至金世宗期间雕刻的私刻大藏经，收入情况可依据《中华大藏经》来考察。其中收录广胜寺印本流志译《须摩提经》和同寺印本法护译《须摩提菩萨经》，前者校勘处有“此经石、资、磧、普、南、径、清无相应校本、仅以丽藏本校”的说明^②，据此可知流志译本未被房山石经、资福藏、磧砂藏、普宁藏，以及明清时代的大藏经所收，仅在金藏和高丽再雕藏中可见。

高丽初雕藏的版本在高宗十九年（1232）遭到焚毁，部分现存于韩国、日本等地，所存卷本有影印出版，但未见流志译《须摩提经》^③。高丽再雕藏在守其主持下，利用开宝藏、契丹藏，以及高丽初雕藏进行了校勘。在校勘基础上，收入了流志译《须摩提经》和法护译《须摩提菩萨经》。《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简称《校正别录》）载：

“服函 须摩提经 法护译本

开元录云、此经前后四译、三存一阙。流志法师有先后二译、其先译者、即一阙也。今捡诸藏、国、宋二藏有法护译、流志后译。而无什译。丹藏虽无流志后译、而有法护、罗什二译。则若二藏互脩、乍似三存具矣…（中略）…又凡重译者、欲异于前、若全同者、何烦重译耶。诸重译经、亦无此例。若异函隔越、势难相准、容有错误、而重载之。如宋藏六字神呪王经、未曾有经之类、是也。今以错重皆删去、今此一函一卷之经、译主虽为二人、经本始终唯一、而重载之者、丹藏之错何甚耶。故今不取丹藏所谓什译者。”^④

守其交待“国、宋二藏”（高丽初雕藏、开宝藏）中收入法护译本和流志后译本，并指出“丹藏”（契丹藏）中法护译本和罗什译本“全同”，因此主张删去罗什译本。

关于此记载有两点说明：一、法护译本和罗什译本“全同”问题。法护译本和罗什译本除去人名、地名等处的翻译不同之外，确实存在很多重合，但并非“全同”。被经录收录较晚的罗什译本，不知是否是由后人刻意修改而来。二、守其的替换违背了不入藏原则。智升规定已被编入《大宝积经》的佛经，不宜再以单经的形式再次入藏。守其用流志译本代替罗什译本入藏，则导致与《大宝积经》妙慧童女会内容重合。

虽然守其明确指出开宝藏和高丽初雕藏中已收有“流志后译”，但从《指要录》、金藏以及高丽再雕藏的收录情况来看，被编入藏的“流志后译”并非《妙慧童女经》，而是《须摩提经》。至此可以确认的是，不同于其他地域的刊本大藏经，只有开宝藏系诸藏将流志译《须摩提经》收作入藏佛经。

四、结语：“藏外佛经”的入藏基准

汉译佛经形成后，一部佛经是否为“藏内”佛经，是能不能被后世保存和信仰者供奉的决定性因素，进而决定了它在东亚汉文佛教文化圈中的地位和影响。智升《开元·入藏录》所收的五千四十八卷佛经，历来被看作是入藏基准。对不同写经、刻经中具体收录情况的个

① 何梅：《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② 《中华大藏经》第九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91页。

③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高丽大藏经初刻本辑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④ 《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卷一，《高丽大藏经》第38册，东国大学校发行1976年，第513页。

案分析,亦成为检验这一定说的重要方法。上文主要阐述了未被收入《开元·入藏录》中的流志译《须摩提经》却在日本古写经和开宝藏系藏本中得以发现的事实。

比较日本古写经和开宝藏系流志译《须摩提经》可知,两者并非完全一致:七寺本一行17字,开宝藏系本一行14字。七寺本“不谄”“过去”“此等”“非耶非捨”“心而量”“作曰”等处;开宝藏系依次作“不谤”“过失”“故此等”“非取非捨”“心所量”“作礼曰”等。这些不同,不但没有体现两者间的巨大分歧,反而反应了七寺本和开宝藏之间的相近性。七寺本的母本很可能是奈良时代从长安带回的写经,和开宝藏系刊本间不同的原因,可能是日本古写经在传抄过程中形成的讹误,亦或是七寺本依据他本校勘后的结果。同时也不排除12世纪的七寺写经中,包含有以10世纪传入日本的开宝藏为底本的写经^①。无论七寺本流志译《须摩提经》是依据奈良写经还是依据开宝藏而来,单从此经得以流传来看,可以说明汉文大藏经形成初期的共同特征,即《开元·入藏录》的“权威”地位在写本一切经时代尚未正式形成^②,各地域的藏经机构仍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的入藏取舍。

就《开元·入藏录》成为实际藏经中的基准而言,最直接和可靠的证据或许是10世纪开始的官刻、私刻大藏经。流志译《须摩提经》在开宝藏以降的高丽再雕藏、北方系统契丹藏和江南系统诸藏中不同的收录情况,刚好从反面验证了《开元·入藏录》的“基准”地位,在汉文大藏经形成过程中的不断强化。

从守其编辑高丽再雕大藏经时,根据佛经内容来决定入藏一事可知,当某一套藏经的编辑主导者能够多方面参照他藏,且做出自身判断时,《开元·入藏录》仅仅发挥参考性而非决定性作用。该套藏经最终的入藏情况,则是谨慎对校和审定后的人为结果。与高丽再雕藏情况不同,契丹藏被认为很可能是据《开元录》书写、后藏于石经山云居寺的一套写经刊刻而来。因此,以契丹藏为底本的辽代房山石经本中未收流志译《须摩提经》,反应的正是以《开元·入藏录》为基准的实态。而第三类江南刊本中,包括福州版(东禅寺版、开元寺版)和湖州版(前思溪藏、后思溪藏)大藏经,不仅年代略晚于开宝藏和契丹藏,刊刻地域也与两者相距较远。但从东禅寺版和后思溪藏的复刻本中均未收入流志译《须摩提经》来看,11至13世纪的江南刊本大藏经也遵循了《开元·入藏录》的收经基准。

综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藏经,对收经“基准”《开元录》的遵照实情,存在略微差异。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理应归入“不入藏录”,但因《开元录》自身收经的不完善和不严密性,导致后世不同藏经中收录的佛经情况不相统一,进而产生了所谓的“藏外佛经”。通过对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入藏个案的分析,可以揭示在汉文大藏经形成的初期阶段存在着对《开元录》的偏离。开宝藏虽因缺乏材料而无法直接分析,但日本奈良时代八世纪的写经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理解八至九世纪中国各地写本一切经的情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以中国佛教传入韩国、日本的单向视角来看东亚佛教的发展,近年来在中国亡佚却保留在日韩的佛教文献之发现,改变了传统上的东亚佛教研究模式,可以说,基于日韩等地域外佛教文献展开的研究,正是一条探索东亚佛教的新路径。

(责任编辑 周广荣)

① [日]落合俊典:《七寺一切經と古逸經典》,第430页;杨婷婷:《日本古写经本〈出三藏記集〉の系統について—興聖寺本を中心に—》,《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62卷通號131,第499—502页。

② 虽然开宝藏及其覆刻本金藏、高丽再雕藏属于刊本大藏经,但由于开宝藏是依据流传于益州的一部写本一切经刊刻而来,故本文将开宝藏的底本归为汉文大藏经形成初期的写本一切经时代。方广钊也曾指出《开元录》在完成之初并未立即成为诸写本藏经的依据。参方广钊:《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第91页。